

《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

题目：“近朱者赤”：同伴捐赠决策信息对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及公正世界信念的作用
作者：张玮玮；陈逸群；朱莉琪

第一轮

审稿人 1 意见：

该研究采用双信息源范式（即，设置了冲突信息源条件）考查青少年亲社会行为受同伴或成人的影响及影响程度。这一角度具有一定的新颖性，也得到了一些有意义的结果。

意见 1：同伴是否要求具有相同能力？同伴（peers）是社会地位相同的人，或者至少在当下是行为复杂程度相似的个体（Lewis & Rosenblum, 1975）。应该还有更恰当、更权威的概念，请作者查阅。

回应：感谢您的意见。我们查阅资料后将其修改为“[同伴往往被视为在社交中处于相同地位的人，或者至少在当下是具有相似的行为复杂性的个体\(Lewis & Rosenblum, 1975\)](#)，如在[年龄、性别或者团体身份等方面具有相似特征\(APA Dictionary of Psychology, 2023\)](#)。”

意见 2：引言 1.1 处“12-16 岁青少年亲社会行为(决定自己和小组之间的代币分配)社会行为随着同伴的出现而增加”，括号前后的内容应该能衔接、通顺、完整。

回应：感谢您的意见。已修改。

意见 3：引言 1.1 处“Foulkes 等人(2018)首先让 755 名 8~59 岁的参与者对自己参与亲社会行为的可能性进行了评估，之后，被试被告知其他人(同伴和成人)对同一问题的平均评分”，将“参与者”改为“被试”，这样也许和后面的“参与”能更好地区分，也与后面的“被试”保持了一致。

回应：感谢您的意见。已将“参与者”修改为“被试”，并 check 全文保持一致。

意见 4：引言 1.1 处“结果发现，8~11 岁的儿童、12~18 岁的青少年都显著改变了他们的评分”。怎么改变了？提高了还是降低了？因为什么而发生了怎样是改变？请明确陈述。

回应：感谢您的意见。已修改为：“8~11 岁的儿童、12~18 岁的青少年都显著改变了他们的评分，特别是当被试的初始评分与观察到的评分之间差异较大时，更容易改变评分。Foulkes 等人(2018)研究中给被试呈现的他人信息实际上是一个随机产生的数字，这个数字可能比被试的初始评分更利他，也可能更利己，但他们并未考察信息性质这一因素的影响。”原文主要关注了被试评分的改变幅度，也就是影响力的大小，并未关注改变的方向。

意见 5：引言 1.1 处 “Ahmed 等人(2020)采用两阶段决策范式”，应该对 “两阶段决策范式” 进行解释，否则后面的 “类似的程序” 也不清楚。

回应：感谢您的意见。已补充表述 “第一阶段给出初始决策，第二阶段在观察他人的决策结果后进行二次决策”。

意见 6：引言 1.1 处，低龄青少年还是早期青少年？

回应：感谢您的意见。已修改为早期青少年。

意见 7：引言 1.1 处 “采用类似的程序测查了 3 组人群(11~14 岁早期青少年、15~18 岁中期青少年、23~35 岁成人)的亲社会行为(需要付出代价，任何未捐赠给慈善机构的代币都将转换为货币并支付给他们)”，括号里的内容应该是对左括号前的 “亲社会行为” 或该行为指标的解释，但目前这个解释看上去不像亲社会行为。

回应：感谢您的意见。我们调整相关表述为 “(需要付出实际代价的)亲社会行为”

意见 8：引言 1.1 处 “以往实验操控”，是对什么的实验操控呢？或者为探究什么问题的实验操控？请说明。

回应：感谢您的意见，我们修改为 “以往考察同伴对青少年决策或行为影响的实验操控”。

意见 9：引言 1.1 处 “研究中的青少年先观看来自一个同龄人或成人的建议之后再做出分享决策，结果发现，相比同伴更不公平的建议，当同伴的建议更公平时，意大利和新加坡的 12 岁青少年均更加慷慨。” 观看.....建议？观看成人的视频如何？题目强调了 “同伴”，这里应该提一提。

回应：感谢您的意见。我们将其修改为：“首先呈现给被试来自一个同龄人或成人的建议，之后要求被试做出分享决策，结果发现，成人的建议对青少年的分享决策没有显著影响；而

相比同伴更不公平的建议，当同伴的建议更公平时，意大利和新加坡的 12 岁青少年均更加慷慨”。原文中成人的建议(公平 vs.不公平)对青少年的分享决策没有显著影响。

意见 10：引言 1.1 处“结合以往在单一信息源情境下的研究结果(e.g., Ahmed et al, 2020; Ruggeri et al., 2018)，以及我国对青少年德育教育工作的重视(周世旺, 2020)”，这两句似乎联系不上。而且我国对青少年德育教育的重视在教育方针、政策、实践等诸多方面都十分明显，比以一篇文献为依据更有说服力。

回应：感谢您的建议。已在引言的第二段补充了关于政策的描述。如“教育部印发的《中小学德育工作指南》中指出，始终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全面提高中小学德育工作水平，引导学生形成积极健康的人格和良好心理品质，促进学生核心素养提升和全面发展(教育部, 2017)”。

意见 11：“假设 H1”，H 本来就是 hypothesis 的简写吧。另外，前面提到了 H1、H2，后面的讨论再没有提及。

回应：感谢您的意见。我们调整表述为“假设一”，并结合假设补充了讨论内容。

意见 12：引言 1.2 处“Foulkes 等人(2018)和 Chierchia 等人(2020)均发现信息来源(同伴/成人)对各年龄组的亲社会行为”，多大的年龄组？

回应：感谢您的意见。我们做了相应补充：Foulkes 等人(2018)研究中是 8~59 岁的被试，Chierchia 等人(2020)研究中测查了 3 组人群：11~14 岁早期青少年、15~18 岁中期青少年和 23~35 岁成人。

意见 13：引言 1.2 处作者提出“反映出……文化差异”，那么，Ruggeri 等人(2018)与 Foulkes 等人(2018)和 Chierchia 等人(2020)研究的被试都来自什么文化背景？如何体现的文化差异？矛盾的影响差异是来自不同的文化吗？

回应：感谢您的意见。Foulkes 等人(2018)和 Chierchia 等人(2020)研究的被试都是来自英国伦敦。他们的研究中，同伴和成人对青少年的影响没有显著差异。本意是想表达可能相比于北美、欧洲等西方文化背景下，亚洲等东方背景下，青少年的亲社会行为更容易受到同伴影响。文化差异只是解释矛盾结果的一个方面，可能更重要的还有实验具体的操纵手段等方面的影响。因此我们对这部分的表述进行了调整。并结合下一条意见补充了文化差异相关论述。

意见 14: 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个体会表现出更高的从众水平, 为什么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的青少年就更容易受到同伴的而不是同时也受到成人的影响呢? 两者之间似乎缺乏更有力的论证。

回应: 感谢您的意见。我们补充了相关论述“相比集体主义文化, 在个人主义文化中, 友谊和同伴对儿童的自我价值有更显著的影响(Chen & French, 2008)。北美儿童和青少年维系友谊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朋友的赞美让他们自我感觉良好。而在以群体或集体为导向的社会中, 如中国(Chen et al., 2004)和印度尼西亚(French et al., 2005)等国家与地区, 友谊提供的工具性帮助(如, 社会适应性行为、学业等方面)对儿童和青少年更重要。因此, 在中国青少年人群中探讨同伴对其亲社会影响是否具有文化特异性或跨文化的一致性是具有理论意义的。此外, 中国文化对儿童顺从的要求较高, 在中国等东亚文化中, 孩子们通常在很小的时候就学会如何遵守父母或权威的要求, 理解社会对其行为的标准(Chen et al., 2018)。考虑到中国文化下的儿童更服从权威(Chen et al., 2000), 我们提出假设二: 青少年更容易受到成人而非同伴的影响”。

意见 15: 请检查参考文献引用格式。如(Reiter, Suzuki et al., 2019)。文末没有此条文献: Allen et al., 2021。文后没有(Li et al., 2022)这篇文献, 2021 还是 2022?

回应: 感谢您的意见。已参照文献著录要求进行了修改, 并核对修改了文献。

意见 16: 2 * 2 请改为 2 x 2, 请写规范。中文论文请写中文, 如 IRB

回应: 感谢您的意见。我们在文中做了相应修改。

意见 17: 任务情境中, 怎样均利己/利他? 怎样体现冲突的? 应在恰当的地方进行简要报告。

回应: 感谢您的意见。我们在引言部分主要详细介绍了冲突条件下的设置。我们补充了实验流程图, 在图注中对这三种条件进行了详细说明, 如“第一阶段为初始捐赠。第二阶段被试观察他人的捐赠结果后做出二次决策。同伴影响和成人影响分成 2 个区组呈现, 并平衡呈现顺序。在第二阶段, 每个试次或捐赠情境中, 被试会同时观察到两个信息。冲突条件下, 一个信息比被试的始捐赠更高, 另一个比其初始捐赠更低, 并且以防产生位置效应, 更利他或更利己的信息随机呈现在屏幕左右位置。均利他条件下, 两个信息均比其初始捐赠更高, 均利己条件则反之”。

意见 18: 被试吗? 作者有时用“被试”, 有时用“参与者”。

回应：感谢您的意见。结合之前的意见，我们已 check 全文并统一表达为“被试”

意见 19：集中施测是如何集中？是被试放在一起集中测试，还是集中到一个时间段进行测试？何时进行的问卷测量？

回应：感谢您的意见。我们补充了相关信息“为了提升同伴影响操纵设置的生态性，我们集中一个时间段对被试进行施测。任务共分为 2 个环节。首先完成实验任务，最后完成问卷调查任务，任务总时长在 30 分钟左右”。

意见 20：2.3 第一句话这句话读起来不太通顺。这么多的“阶段”，请明确。同一个阶段尽量用同样的表达。

回应：感谢您的意见。我们修改并统一了表述。

意见 21：实验程序中同伴决策结果的设置为什么是 70 或 90 或 100？总分或分数范围多少？如何计分的？应在恰当地方报告。

回应：感谢您的意见。我们补充了设置的理由：“每轮分配给被试 100 个代币，被试的初始决策为 FD (first decision; 量程为[0, 100])，他人的决策为 PD (peer's decision)。PD 与 FD 的差值 Δ 的取值范围最大不超过 30，是由于我们在之前的实验中发现青少年初始捐赠的平均值为 63.12 (SD= 33.00)。此外，Foulkes 等人(2018)发现，当被试的初始评分与观察到的评分之间差异较大时，他们更容易改变评分，因此为了进一步控制在利他和利己条件下 PD 的差异，我们将 Δ 的量程取为[0, 30]”。

意见 22：建议将 3.1.1 第二段移至上一段之后。另外，文中没有“(见表 1)”的表达。

回应：感谢您的建议。我们调整至上一段之后，并补充了“见表 1”的表述。

意见 23：使用复杂统计方法建议介绍一下使用条件或该研究使用的理由。简单概括的一两句话即可，其他同。

回应：感谢您的意见。我们补充了相关理由：“在这个线性混合模型(LMM)和随后的模型中，有两个因素作为随机效应被包括在内：被试的 ID 和捐赠情境，以控制个体差异和特定情境引起的对社会影响敏感性的差异”。

意见 24: 3.1.1 处“均利他条件下，二次决策比初始决策显著得更利他”，这句话读起来别扭。

回应: 感谢您的意见。我们将其修改为“均利他条件下，二次决策的捐赠数额显著高于初始决策的捐赠数额($M_{\text{二次}} - M_{\text{初始}} = 9.27, p < .001$)”。

意见 25: $p = .003 < .01$, 这是否是《心理学报》要求的格式? 请核查。

回应: 感谢您的意见。我们根据《心理学报》的格式要求进行了检查并修改。

意见 26: 建议将 3.1.2 和 3.1.3 合并到一个三级标题下。

回应: 感谢您的建议。我们将其合并为 3.1.2。

意见 27: 图题不够明确、规范。其他图题请作者自行检查并规范。图 2 中, 作者是要表达事后检验的两个结果, 还是只表达主效应? 请检查图 4 中 Y 轴名称是否合适。

回应: 感谢您的意见。我们仔细检查并修改了每一个图题使之规范。图 2 只是表达主效应显著。图 4 的 Y 轴名称是想表达二次决策结果, 鉴于二次决策结果即是在社会信息影响下的结果, 因此简述为社会影响下的决策结果。

意见 28: 3.1.3 的利他条件是“均利他”吗? 既然该研究特别强调, 就请明确。

回应: 感谢您的意见。我们修改为了“均利他”。

意见 29: χ^2 等非英文统计符号不斜体, 其他同。

回应: 感谢您的意见。我们做了相应修改并 check 了全文。

意见 30: 建议讨论部分加二级标题。

回应: 感谢您的意见。我们在讨论部分增加了二级标题: 4.1 青少年亲社会行为受到的同伴影响, 4.2 公正世界信念的调节作用, 4.3 研究不足。

意见 31: 公正世界信念调节了 12-15 岁青少年的亲社会影响。请完整准确表述。

回应: 感谢您的意见。我们补充了表述: “与低公正世界信念的个体相比, 高公正世界信念个体中利他信息对二次捐赠结果的预测作用更为显著”。

意见 32：结论应该是更概括的总结，请结合标题及核心发现并与结果进行区分来撰写。

回应：感谢您的意见。我们将结论修改为：

(1)青少年的亲社会行为容易受到积极而非消极的社会影响。

(2)同伴(相对于成人)对于青少年的影响具有特异性。特别是，当青少年同时观察到利他和利己的信息时，其二次捐赠更容易朝向利他方向改变，且这种转变更容易发生在同伴影响的条件下。

(3)公正世界信念调节了 12-15 岁青少年所受到的亲社会影响。

(4)同伴影响是一种适应性策略，它的收益超过了有时伴随它的成本。

.....

审稿人 2 意见：

采用自适应行为实验的方式考察了不同的信息提供者和社会信息的性质对 12~15 岁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影响，以及公正世界信念在其中的调节作用。

意见 1：“研究才开始探索同伴对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列举这 6 个研究仅仅为了说明同伴对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影响？需要说明与本研究的关系。

回应：感谢您宝贵的意见与建议。我们在引言部分补充梳理了这几个研究之间的关系，以及与本研究的联系。如，“以往研究关于青少年对社会影响易感性发现的矛盾之处，可能是由于对他人信息性质(更利他 vs.更利己)的操纵不一致导致的。如，Foulkes 等人(2018)研究中给被试呈现的他人信息实际上是一个随机产生的数字，这个数字可能比被试的初始评分更利他，也可能更利己。Ahmed 等人(2020)研究中呈现给被试的同伴信息也是随机生成的数字(2~8 之间的随机数，量程为 1~10)。Ahmed 等人(2020)虽然尝试考察了信息性质的影响，但他们也并未对其进行严格操纵，被试观察到的信息比其初始决策更利他还是更利己是不确定的。因此本研究借鉴 Chierchia 等人(2020)的研究采用自适应手段对信息性质进行了严格操纵，设置在利他影响下条件，被试观察到的他人决策信息总是比其初始决策更利他，同理，在利己影响条件下，被试观察到的信息比其初始决策更自私。即，被试观察到的他人捐赠数额的多少是由其初始捐赠数额决定的，因此为自适应。这样的操控有助于更清晰地探讨观察到的不同信息性质是否对被试的决策有不同影响。”

意见 2：“本研究采用自适应的方式将信息性质的方向”，何为“自适应”，需介绍清楚。

回应：感谢您的建议。我们在引言以及方法部分补充介绍了自适应的含义及操作。我们在引

言中补充道：“借鉴 Chierchia 等人(2020)的研究对信息性质进行了严格操纵，设置在利他影响下条件，被试观察到的他人决策信息总是比其初始决策更利他，同理，在利己影响条件下，被试观察到的信息比其初始决策更自私。即被试观察到的他人捐赠数额的多少是由其初始捐赠数额决定的，因此为自适应。”

意见 3：标题 1.2 建议放在本研究的一个段落里面；

回应：感谢您的建议。我们将 1.2 的内容进行了扩充，使之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部分。

意见 4：“集体主义和保守主义高、自主性低的社会中”，参考文献是 1996 年的，是否需要考虑改革开放，全球化思潮对青少年的影响？

回应：感谢您的建议。我们补充了较新的文献依据：“研究者认为，目前人们对同伴影响中的文化和种族差异知之甚少(Chen et al., 2018; Laursen & Veenstra, 2023)，几乎所有关于同伴影响的研究都来自北美或欧洲的样本，迫切需要在非西方国家进行研究(Laursen & Veenstra, 2023)。并非所有的文化都在同样程度上强调同伴关系的重要性，同伴影响可能因文化而异。相比集体主义文化，在个人主义文化中，友谊和同伴对儿童的自我价值有更显著的影响(Chen & French, 2008)。北美儿童和青少年维系友谊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朋友的赞美让他们自我感觉良好。而在以群体或集体为导向的社会中，如中国(Chen et al., 2004)和印度尼西亚(French et al., 2005)等国家与地区，友谊提供的工具性帮助(如，社会适应性行为、学业等方面)对儿童和青少年更重要。因此，在中国青少年人群中探讨同伴对其亲社会影响是否具有文化特异性或跨文化的一致性是具有理论意义的。此外，中国文化对儿童顺从的要求较高，在中国等东亚文化中，孩子们通常在很小的时候就学会如何遵守父母或权威的要求，理解社会对其行为的标准(Chen et al., 2018)。考虑到中国文化下的儿童更服从权威(Chen et al., 2000)，我们提出假设二：青少年更容易受到成人而非同伴的影响。”

部分参考文献如下：

- Chen, X., & French, D. C. (2008). Children's social competence in cultural context.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59, 591–616.
- Chen, X., Lee, J., & Chen, L. (2018). *Culture and peer relationships*. In W. M. Bukowski, B. Laursen, & K. H. Rubin (Eds.), *Handbook of peer interactions, relationships, and groups* (pp. 552–570). The Guilford Press.
- Laursen, B., & Veenstra, R. (2023). In defense of peer influence: The unheralded benefits of conformity. *Child Development Perspectives*, 17(1), 74–80. <https://doi.org/10.1111/cdep.12477>

意见 5：“公正世界信念可以在社会认知与亲社会行为之间起到调节作用”这段，举的例子是社会自我效能感、仁慈，与同伴的关系在哪？并没有明显地聚焦回本研究。

回应：感谢您的意见与建议。我们在引言 1.3 和讨论 4.2 的部分补充了相关文献依据。

引言 1.3 处“公正世界信念越强的个体更倾向于用积极的想法和态度解决问题，其亲社会行为也比其他人多(Kaliuzhna, 2020)。在同伴交往中，同伴关系会对青少年的公正世界信念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健康的同伴关系会导致一系列的积极结果，而不健康的同伴关系则会产生相反的影响。例如，BJW 与青少年时期的同伴伤害(校园欺凌)呈负相关(Correia & Dalbert, 2008)。杨莎莎和陈思静(2022)发现，高 BJW 的个体会在一定程度上高估他人的亲社会行为，进而容易受到亲社会影响表现得更利他。”

讨论 4.2 处“高 BJW 的青少年能够有效调整对负面刺激或不公正行为的态度，从而更少反社会或攻击行为；而低 BJW 的青少年存在不公平的认知模式，更容易受到负面刺激或信息的影响(Zhang et al., 2022)。”

部分参考文献如下：

Correia, I., & Dalbert, C. (2008). School bullying: Belief in a personal just world of bullies, victims, and defenders.

European Psychologist, 13(4), 248–254. <https://doi.org/10.1027/1016-9040.13.4.248>

杨莎莎, 陈思静. (2022). 第三方惩罚中的规范错觉：基于公正世界信念的解释. *心理学报*, 54(3), 281–299.

Zhang, R., Zhang, C., & Xu, W. (2022). Longitudinal association of peer victimization with aggression and self-injury in adolescence: The mediating role of belief in a just world.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96, 111706. <https://doi.org/10.1016/j.paid.2022.111706>

意见 6：三个假设提出的价值何在？

回应：感谢您的宝贵意见。我们对本研究问题提出的逻辑与假设的意义做如下说明：

同伴对青少年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Blakemore & Mills, 2014)。然而，以往同伴影响的相关研究多集中于冒险和不当行为，同伴影响的积极方面没有得到足够重视(Laursen & Veenstra, 2023)。同时，亲社会行为对青少年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Telzer et al., 2018)。特别是，目前几乎所有关于同伴影响的研究都来自北美或欧洲的样本，迫切需要在非西方国家进行研究(Laursen & Veenstra, 2023)。因此，我们探讨同伴对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首先，以往相关研究在依托于行为实验手段探讨同伴的积极影响时，存在以下不足之处：

第一，对呈现给被试的他人决策信息性质(更利他 vs. 更利己)的操纵不一致。如，Foulkes 等人(2018)和 Ahmed 等人(2020)研究中给被试呈现的他人信息实际上是一个随机产生的数

字，这个数字可能比被试的初始评分更利他，也可能更利己。他们并未对信息性质这一变量进行严格操纵。因此，本研究采用自适应手段对信息性质进行严格操纵，被试观察到的他人捐赠数额的多少是由其初始捐赠数额决定的，如利他影响下条件，被试观察到的他人决策信息总是比其初始决策更利他，同理，利己影响条件下，被试观察到的信息比其初始决策更自私。

第二，以往考察同伴对青少年决策或行为影响的实验操控一般围绕同伴是否在场，或给被试呈现一个群体(在某问题上)的评价结果来进行。Toelch 和 Dolan (2015)指出，这样的实验操作往往考察的是社会规范的影响(normative influences)。然而，在大多数关于建议采纳或社会信息影响的研究中，参与者一般都是在私下做出决定，此时他们可能较少受到社会规范的影响，而更多地是考虑他人信息本身来做出最后的决定。因此，排除了规范在其中的混淆作用，本研究关注社会信息本身的影响。

第三，以上研究大多采用的是单一信息源研究范式(e.g., Foulkes et al., 2018; Knoll et al., 2015)。在每个实验试次中，被试观察到的他人决策信息要么是利他的，要么是利己的，此时无法确定青少年行为的改变是对社会信息表现出无差别的顺从或从众还是真正受到了影响。因此，本研究借鉴了儿童选择性信任的相关研究范式，即冲突信息源范式(conflicting sources paradigm; Koenig & Harris, 2005)。本研究将信息性质的方向操纵为冲突信息源条件，以及均利他和均利己的非冲突信息源条件。冲突条件下，在每个试次中同时给被试呈现两个信息：一个信息比被试的初始决策更利他，另一个比被试的初始决策更利己，这样的操作有助于避免被试产生对单一信息的无差别的顺从或服从，以此来揭示青少年亲社会行为更容易受到积极的还是消极的社会影响，抑或都有。综上，我们提出假设一：青少年更容易受到利他信息影响。

其次，我们考察同伴(相对于成人)是否对青少年的影响具有特殊性。源于：学龄前儿童更倾向于向权威(可靠、知识渊博或地位高的成人)而非同伴学习(Mills et al., 2011)，而青少年可能更容易受到同伴提供的信息的影响而非成人(Ruggeri et al., 2018)。然而，考虑到中国文化下的儿童更服从权威(Chen et al., 2000)，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二：青少年更容易受到成人而非同伴的影响。

最后，同伴影响延申到了亲社会领域，但影响的机制仍然未知(Samek et al., 2020)。Telzer 等人(2021)也指出，尚不清楚哪些潜在过程使青少年更容易受到同伴影响。差异易感性理论(Belsky & Pluess, 2009)假设某些个体对所处的环境有更高的敏感性，这将导致他们在积极的环境中有更多的适应结果，在消极的环境中有更多的不适应结果。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在同伴

影响中受益，在同伴影响产生的积极效果方面存在个体差异(Laursen & Veenstra, 2023)。因此，我们探讨作为一种内隐正义动机的公正世界信念是否调节个体所受社会影响的程度，进而提出了假设三。

这些假设的验证有助于回答同伴决策信息怎么影响以及如何影响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科学或现实问题。

部分参考文献如下：

Laursen, B., & Veenstra, R. (2023). In defense of peer influence: The unheralded benefits of conformity. *Child Development Perspectives*, 17(1), 74–80. <https://doi.org/10.1111/cdep.12477>

Samek, A., Cowell, J. M., Cappelen, A. W., Cheng, Y., Contreras-Ibáñez, C., Gomez-Sicard, N., Gonzalez-Gadea, M. L., Huepe, D., Ibáñez, A., Lee, K., Malcolm-Smith, S., Salas, N., Selcuk, B., Tungodden, B., Wong, A., Zhou, X., & Decety, J. (2020).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comparisons and sharing behavior across 12 countrie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Child Psychology*, 192, 104778-104778. <https://doi.org/10.1016/j.jecp.2019.104778>

Telzer, E. H., Jorgensen, N. A., Prinstein, M. J., & Lindquist, K. A. (2021). Neurobiological sensitivity to social rewards and punishments moderates link between peer norms and adolescent risk taking. *Child Development*, 92(2), 731-745. <https://doi.org/10.1111/cdev.13466>

意见 7：“公正世界信念量表”信度如何，

回应：感谢您的意见。我们在 2.2 实验材料处补充了相关信息：“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alpha = 0.86$ 。”

意见 8：实验流程部分建议画一个流程图。

回应：非常感谢您的建议。我们在 2.3 实验程序的部分补充了流程图。

意见 9：结果部分建议结合假设进行分析，尤其是 3.1 下面的 4 个分析，显得很杂乱，为什么用 LMM 或 GLMM？p 值一般需要跟着统计值出现，

回应：感谢您的意见与建议。在我们的实验任务中，被试会看到多个捐赠情境，为了控制特定情境以及个体差异对结果的混淆，我们在 LMM 和 GLMM 的模型中，将被试的序号和捐赠情境这两个因素作为随机效应包括在内。此外，为了进一步验证结果，我们参考 Chierchia 等人(2020)在 *Psychological Science* 上发表的文章中的编码方式对因变量进行编码，进行了

影响比例的分析：被试的二次决策按照社会信息的方向转变编码为 1，否则编码为 0。因变量被编码为二分变量，因此需要使用 GLMM 的分析。当被试二次决策发生改变时，为了考察其改变幅度，我们进行了影响程度的分析。最后，冲突信息源的设置相对较为复杂，被试同时观察到更利他和更利己的信息，此时我们考察当被试二次决策发生转变时是朝利他方向转变还是利己方向转变，因此我们单独对冲突信息条件进行了进一步分析。

我们也在结果处补充了事后检验或简单效应检验的其他统计值。

意见 10：“item”“trial”应该有对应的中文翻译。

回应：感谢您的建议。我们已将其修改为“决策情境”、“试次”，并检查全文，修改了类似表达。

意见 11：讨论部分逻辑建议结合假设和结果，作出详细的解释。

回应：感谢您的建议。我们结合假设，重新梳理并丰富了讨论部分。请见文中蓝色字体部分。

意见 12：部分标点、空格、参考文献格式不对。

回应：感谢您的建议。我们仔细检查了全文，修改了标点符号、空格问题以及参考文献的格式。

.....
编委复审意见：

论文总体质量较高，但仍需结合审稿专家包括这里给出的意见与建议进一步推敲修改。

意见 1：论文语言表述的准确性、清晰性需要加强，论文研究问题提出的逻辑需要进一步加强，尤其是引言的第一段，要进一步把研究问题、问题提出的背景概括清晰。

回应：非常感谢您宝贵的意见。我们重新梳理了引言前两段以及其他部分的写作逻辑，见修订模式修改稿。部分修改内容如下：

我们在引言第一段补充强调了问题提出的背景和创新之处，如：“以往同伴影响的相关研究多集中于冒险和不当行为，同伴影响的积极方面没有得到足够重视(Laursen & Veenstra, 2023)。”

在引言的其他部分，我们加强了问题提出的内在逻辑：

在 1.1 的部分, 我们着重补充梳理了以往研究的几个不足之处: (1)对呈现给被试的他人决策信息性质(更利他 vs.更利己)的操纵不一致, 如, Foulkes 等人(2018)和 Ahmed 等人(2020)并未对其进行严格控制。因此, 本研究采用自适应手段严格操作信息性质进行严格操纵。(2)以往考察同伴对青少年决策或行为影响的实验操控一般围绕同伴是否在场, 或给被试呈现一个群体(在某问题上)的评价结果来进行, 往往混淆了社会规范的影响(normative influences)。本研究围绕信息本身的影响进行探究。(3)以往相关研究大多采用的是单一信息源研究范式, 在每个实验试次中, 被试观察到的他人决策信息要么是利他的, 要么是利己的, 此时无法确定青少年行为的改变是对社会信息表现出无差别的顺从或从众还是真正受到了影响。因此, 本研究借鉴了儿童选择性信任的相关研究范式, 即冲突信息源范式(conflicting sources paradigm; Koenig & Harris, 2005)。

综上, 我们首先考察青少年的亲社会行为受到怎样的同伴(假设一): 青少年更容易受到利他信息影响。其次, 我们考察同伴(相对于成人)是否对青少年的影响具有特殊性。源于: 学龄前儿童更倾向于向权威(可靠、知识渊博或地位高的成人)而非同伴学习(Mills et al., 2011), 而青少年可能更容易受到同伴提供的信息的影响而非成人(Ruggeri et al., 2018)。然而, 考虑到中国文化下的儿童更服从权威(Chen et al., 2000), 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二: 青少年更容易受到成人而非同伴的影响。最后, 同伴影响延申到了亲社会领域, 但影响的机制仍然未知(Samek et al., 2020)。Telzer 等人(2021)也指出, 尚不清楚哪些潜在过程使青少年更容易受到同伴影响。差异易感性理论(Belsky & Pluess, 2009)假设某些个体对所处的环境有更高的敏感性, 这将导致他们在积极的环境中有更多的适应结果, 在消极的环境中有更多的不适应结果。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在同伴影响中受益, 在同伴影响产生的积极效果方面存在个体差异(Laursen & Veenstra, 2023)。因此, 我们探讨作为一种内隐正义动机的公正世界信念是否调节个体所受社会影响的程度, 进而提出了假设三。

部分参考文献如下:

Laursen, B., & Veenstra, R. (2023). In defense of peer influence: The unheralded benefits of conformity. *Child Development Perspectives*, 17(1), 74–80. <https://doi.org/10.1111/cdep.12477>

Samek, A., Cowell, J. M., Cappelen, A. W., Cheng, Y., Contreras-Ibáñez, C., Gomez-Sicard, N., Gonzalez-Gadea, M. L., Huepe, D., Ibáñez, A., Lee, K., Malcolm-Smith, S., Salas, N., Selcuk, B., Tungodden, B., Wong, A., Zhou, X., & Decety, J. (2020).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comparisons and sharing behavior across 12 countrie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Child Psychology*, 192, 104778-104778. <https://doi.org/10.1016/j.jecp.2019.104778>

Telzer, E. H., Jorgensen, N. A., Prinstein, M. J., & Lindquist, K. A. (2021). Neurobiological sensitivity to social rewards and punishments moderates link between peer norms and adolescent risk taking. *Child Development*, 92(2), 731-745. <https://doi.org/10.1111/cdev.13466>

意见 2: 论文格式上比如引言中采用了英文的写作格式, 假设 1.假设 2.以及 1.4 本研究这样表述是否合适?

回应: 感谢您的意见。我们将其调整为假设一、假设二, 并将“本研究”改为“研究概览”。

意见 3: 论文的讨论部分需要加强, 研究结果对现有理论有怎样的贡献需要进一步阐述。

回应: 感谢您的意见。我们重新梳理并加强了讨论的各个部分, 特别是补充了对现有理论的贡献之处。部分修改内容如下:

讨论 4.1 处“社会学习理论指出, 个体通过观察和模仿他人来学习行为、态度和社会规范(Bandura, 1965), 这种能力在婴儿期出现(Wood et al., 2013)。社会学习理论最初是为了描述犯罪和越轨行为而发展起来的, 但其观点也可以应用于积极的社会学习领域(Telzer et al., 2018)。本研究结果支持并拓展了社会学习理论的观点: 观察他人的决策结果可以影响青少年的亲社会行为。并且, 青少年在这种社会学习过程中表现出了选择性: 相比较利己信息的影响, 青少年的亲社会行为更容易受到利他影响; 相比较成人提供的信息, 青少年更容易受到同伴提供的信息的影响。选择性社会学习(selective social learning)或选择性信任(selective trust)的观点进一步指出, 儿童对他人提供的信息并非被动地全盘接受, 而是有选择地采信(Koenig & Harris, 2005)。”

讨论 4.2 处“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在同伴影响中受益, 在同伴影响产生的积极效果方面存在个体差异(Laursen & Veenstra, 2023)。差异易感性理论(Belsky & Pluess, 2009)假设某些个体对所处的环境有更高的敏感性, 这将导致他们在积极的环境中有更多的适应结果, 在消极的环境中有更多的不适应结果。与低公正世界信念的个体相比, 高公正世界信念个体中利他信息对二次捐赠结果的预测作用更为显著。”本研究的发现进一步拓展了社会学习理论的观点。

第二轮

审稿人 1 意见:

修改回复完整详细。

回应: 感谢专家对我们修改稿的认可与肯定。

编委复审意见：

论文依据审稿意见与建议做了较好的修改，论文研究问题明确有意义有创新，研究方法恰当，结果结论可靠。

意见 1：但论文语言表述上仍然需要进一步的修改，一些语言表述比较宽泛，如“在这个时期里，同伴往往能对青少年产生巨大影响”等

回应：感谢您的意见与建议，我们在文中做了修改，并检查和调整了文章其他部分的表述，相关修改内容以蓝色字体标识。

意见 2：引言与讨论部分一些内容过于冗长，如：我国对青少年的健康发展十分重视，特别是德育教育工作十分重视方面。教育部印发的《中小学德育工作指南》中指出，始终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全面提高中小学德育工作水平，引导学生形成积极健康的人格和良好心理品质，促进学生核心素养提升和全面发展（“教育”教育部, 2017）。近日，为进一步发挥各级关工委和广大“五老”在教育、引导、关爱、保护青少年方面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作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工作的意见》（“中共”，2022）。这些政策层面表述在论文中可以删去。

回应：感谢您的意见与建议，我们删除了相关表述并调整了论述逻辑。

意见 3：另外，引言与讨论的逻辑也需要进一步加强。修改后再审。

回应：感谢您的宝贵意见，我们调整了引言和讨论的部分陈述，加强了陈述的逻辑。相关修改内容以蓝色字体标识。

第三轮

编委复审意见：作者依据修改意见对论文做了充分的修改，论文达到了学报发表论文的标准与要求，建议录用。

主编终审意见：研究选题有理论和实际价值，特别是对于社会性形成期的青少年的亲社会行为的规律探讨更加应景。研究发现，社会捐赠信息（利他、利己、冲突）和信息提供者（同伴与成人）对捐赠行为有影响，还探讨了公正世界信念的调节作用。得到一些有趣的结论，

(1) 相比较利己信息的影响,青少年更容易受到利他信息的影响,从而提高捐赠数量;(2) 当同时观察到冲突信息时,青少年仍然受到利他影响;(3) 青少年更容易受到同伴榜样而非成人榜样的影响;(4) 公正世界信念调节了青少年的亲社会影响。还有如下几个问题:

意见 1: 题目: 同伴决策信息, 是否改成“同伴捐赠决策信息”?

回应: 感谢您的意见, 已把题目修改为《“近朱者赤”: 同伴捐赠决策信息对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及公正世界信念的作用》。

意见 2: P19 100 个代币的剩余部分作为被试费? 这个费用是如何转换的? 因为不同的强度可能对被试的捐赠有影响? 是先明确, 还是后面解释被试费?

回应: 感谢您的意见。每轮给被试 100 元的代币, 被试没有捐赠出去的代币可以折算为真实的实验报酬。两个阶段的实验共有 36 轮, 代币的量程为[0, 3600], 共分四档发放被试费, 剩余代币在[0, 800]为第一档, [801, 1600]为第二档, [1601, 2400]为第三档, [2401, 3600]为第四档, 被试费随之递增。

兑换比例并未告知被试, 是参考以往研究为了避免被试在做决策时计算代币能转换为多少货币, 从而增加认知负荷(Chierchia et al., 2020)。

实验之前告知被试, 没有捐赠出去的代币可以折算为真实的实验报酬, 剩余的代币越多, 报酬越多。实验后跟被试解释被试费发放的具体要求, 也就是兑换情况。

意见 3: P21 被试的 ID, ID 需要加英文注释, 捐赠情境则需要解释其特性是什么?

回应: 感谢您的意见, 我们已将 ID 改为序号。为了避免被试对不同捐赠情境的偏好的影响, 我们将其作为随机效应进行控制。